

余英时文化危机与文化重建思想述略*

李梦云

(温州医学院 社科部, 浙江 温州 325035)

摘要:余英时认为,近代以来中国思想界的持续激进化使传统文化破坏殆尽,学术的政治化和功利化贻害深远,今天必须认识到文化重建的重要性;而中国传统文化中内涵一定的现代性因素,这为中国文化重建提供了动力,在此基础上余英时提出了中国文化重建的基本主张。

关键词:余英时;文化危机;文化价值;文化重建

中图分类号:G0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7-4074(2010)06-0055-04

作者简介:李梦云(1978-),湖南祁阳人,北京师范大学博士研究生,温州医学院社科部讲师。

对于中国文化的危机与前景这个宏大主题,余英时可以说是所有海外华裔学者中涉笔最多的一个。他看重文化的力量,有着深厚的中国文化情怀,对中国的文化重建问题给予了高度关注和深刻思考。在经济迅猛发展,而文化发展相对滞后的中国,考察余英时文化危机与文化重建思想,对推动传统文化的现代化及和谐社会的构建,具有重要的启迪意义。

一 中国近代以来的文化危机使文化重建成为必然

余英时认为,今天中国的危机主要是文化的危机。中国近代的文化危机使传统文化破坏殆尽,政治力量上升到主宰地位,而文化力量则退居于无足轻重的位置,学术的政治化和功利化日趋严重,今天必须重新认识文化重建问题的重要性。

(一) 传统文化破坏殆尽

中国文化在近代以后陷入了严重的危机,这个“危机”的最大表征,根据余英时的诊断,是知识界和思想界的持续激进化。一部中国近现代思想史

就是一个持续激进化的过程,五四运动是其重要的分水岭。五四之前,从魏源的“师夷之长技以制夷”,到李鸿章等人的“洋务运动”,到张之洞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再到康有为、梁启超的“戊戌变法”,最后到孙中山的“共和革命”,激进变革的思想逐步加深,从器物层面达到政治层面,但在那时还没有动摇整个传统文化体系;而五四运动则将保守与激进的对峙推进到文化层面,并最终摧毁了中国文化传统的整个体系。^{[1](P193-201)}这几个阶段清晰显示出:中国人对自己的文化是从局部修改发展到全盘舍弃,对西方文化则从局部吸收发展到全盘“拥抱”。“自‘五四’以后,中国人(至少知识分子)逐渐建立了一个牢不可破的观念,即以为中国文化传统是现代化的主要障碍;现代化即是西化,而要现代化则必须从彻底摧毁中国文化传统为前提。”^{[2](P503)}

(二) 学术的政治化和功利化贻害深远

余英时认为文化建设必须立足于深厚的学术思想基础之上。但是,近百年来中国没有一个持续不断的文化建设运动,五四新文化运动还来不及在

* 收稿日期:2010-10-14

学术思想方面有深入的成就,便卷入了政治的漩涡。中国人在“救亡”心情下要求用西方“真理”来彻底而迅速地改造中国,速变和全变成为近代知识分子的基本心态。依照这样的心理发展,革命便成了惟一的“救亡”之道。而一旦“革命”登场,政治(包括军事)力量便上升到主宰的地位,文化力量则退居于无足轻重的位置。长期的“革命”最后使许多人相信“政治决定一切”。^{[2](P505)}为了尽快地以西方“真理”来改造落后的中国,中国文化在被仓促推上手术台之后又染上了另一个严重的“病灶”,即功利化地对待思想文化,其中以学术的政治化尤为贻害深远。

(三) 知识分子缺乏深层的文化认同

余英时还认为今天的文化危机还特别表现在青年知识分子的浮躁心理上。“他们浮慕西化却并不深知西方文化底蕴,憎恨传统而不解中国传统文化为何物。他们的思想境界没有超越‘五四’人物,但以中国学术的修养而言,又远不及‘五四’先辈那样坚实。”^{[2](P506-507)}中国知识界至今似乎还没有完全摆脱殖民地心态,一切以西方观念为最后依据,始终摆脱不掉“尊西人若帝天,视西籍如神圣”的心态。如果这种心态不能根本扭转,中国是很难确立文化上的自我认同的,进而也就无法从一个多世纪的文化危机中解脱出来。

因此,为了从百年来的文化危机中摆脱出来,重建中国文化,必须首先摈弃一切以西方文化为判断标准的“激进西化”的思维模式,确立中国文化的本体地位;其次还要摈弃学术政治化和功利化的惯性,确立“为知识而知识”的真正科学精神;最后,要在知识界最终达成核心的中国文化认同。

二 中国传统文化内涵一定的现代性因素为中国文化重建提供了推动力量

余英时认为中国传统文化与现代生活并不互相排斥,中国人的现代生活其实也就是中国文化在现阶段的具体表现。即“所谓‘现代’即是‘传统’的‘现代化’;离开了‘传统’这一主体,‘现代化’根本无所附丽。”^{[3](P7-9)}中国传统中并不乏现代性的合理因子,如能及时善加诱发,就能够成为推动现代化发展的重要力量。余英时对中国文化传统的现代价值论述比较丰富,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 中国传统文化强调人的价值和尊严

“人人把人当人”是现代社会的普遍信念,这个信念也是民主理论的基础。民主作为一种尊重人性的政治理想而言,和儒家与道家的一些中心观念有相通之处。在中国文化中,人的尊严观念自孔子以来便巩固地成立了。孔子用“仁”字来界定“人”字,孟子说“人皆可以为尧舜”,荀子说“涂之人可以为禹”,陆象山更进一步提出“不识一字也要堂堂做一个人”的口号。中国人大都接受这种看法,因此人人都有尊严。人所以为“人”,不在于是否有知识、有地位、有财富,而在于个人的抉择。

在中国文化的价值系统中,人的尊严的观点遍及一切人,奴隶也不例外。中国社会根据“天地之性人为贵”的思想始终否认人应该变成奴隶。都是中国民主精神的凭借,可以通过现代的法制结构而转化为客观的存在。西方直到近代才有康德强调必须把人当作目的,而不是手段的思想,而这种思想中国自古以来一直存在。因此,余英时就此认为就人的尊严这一点来讲,中国文化早已是现代性的了。^{[2](P459-460)}

(二) 中国传统文化具有“君子”理想

儒学具有修己和治人两个无法截然分开的方面。余英时认为,无论是修己还是治人,儒家都以“君子”理想为其枢纽:修己的目的是成为“君子”,治人则必须先成为“君子”。^{[4](P103)}从这一角度来说,儒学事实上便是“君子之学”。在余英时看来,孔子理想中的“君子”是以内在的“仁”为根本,而同时在外在的行为方面又完全合乎“礼”的人。“君子”的本质是“仁”,故“君子之道”之道实际上就是“仁道”。“君子”既是“仁者”,则君子必须注重自己的内心修养,坚持“克己”、“自省”其目的不是仅仅是为了自我解脱,也在于“推己及人”,拯救天下。所以“君子之道”同时又必须层层外推,不能止于自己。

中国传统儒家思想系统中,有一套完整的有关如何通过道德理性、道德体验来发明道德本性、道德自我,来提高道德境界的思想系统,并建立起人伦道德的秩序。可以说,在伦理道德的方向上,儒家“君子”理想蕴含了尊重理性、肯定自我、相信个人、刚健有为等一系列与现代性相容的价值观念。儒家的“君子”理想无疑具有其现代的、“现代以后”的意义。

余英时认为,西方自柏拉图开始便有“静观的人生”和“行动的人生”之分。近代以来“行动的人生”凌驾于“静观的人生”之上,产生了许多弊端,如

人们大都不能“思其所行”而陷入“人莫不饮食，鲜能知味”的困境。儒家一开始便走上了动静二分的途径，它以自我为中心而展开的循环圈具有即动即静、即思即行的性格，具有“刚毅进取”、自强不息的精神。这种精神也表现为中国思想家从来不看重灵魂不灭的观念而积极地肯定人生，通过“立功、立德、立言”来保证人的“永生”。这些都是儒家对两个世界之间关系的积极主张，也是“道不远人”的观念的延伸。因此，从西方的观点来看，儒家“君子”的刚毅进取的精神既非纯“传统的”，也非纯“现代的”而是介于两者之间、且兼而有之的。事实上，这是一种最合于现代生活的“宗教信仰”。^{[4](P122)}

（三）中国传统文化蕴含万物和谐理念

余英时认为中国的传统文化中蕴含着深刻的万物和谐的思想。老子说：“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可见，“道”的根本内涵就是自然。万物因自然而生，因自然而成，自然乃是天地万物产生存在的根本，亦是其和谐存在与正常发展的最终依据。万物都各有其自然之道，天地间事物的千差万别正是其自然之道作用的结果。儒家一向把人作为天下最贵者，但人并不与自然天地、草木鸟兽相对立，人也只是和谐宇宙的一部分。宋代儒者讲“人与天地万物一体”，讲仁爱之心遍及鸟兽、草木、瓦石，讲“民吾同胞，物吾与也”，都是十分鲜明的例证。这表明中国的人文精神与自然并不对立，不会导致一种人类中心主义以及对自然的宰制和占有，相反，它讲求的是与自然的协调。

今天，原子毁灭的危险、自然生态的破坏、能源耗竭的危机等都对人类文明构成了很大的威胁。“科技”日益征服世界，并且宰制了人，“科技”的负面效应在日益增大。而中国传统文化中“人与天地万物一体”的自然观，以及“尽物之性”、“万物并育而不相害”的精神，在开发资源时尽量做到尽物之性、顺物之情和天地万物协调发展，而不是征服。这样则可以较好地避免“科技”主宰世界的危机。因此中国“人与天地万物一体”的自然观虽然不是现代的，却具有超现代的意义。^{[4](P29-30)}

三 余英时中国文化重建的基本主张

余英时认为中国文化重建的问题事实上可以归结为中国传统的基本价值与中心观念在现代化的要求下如何调整与转化的问题。究竟如何转化，余英时提出了如下基本主张：

（一）重建价值系统

余英时认为中国文化重建必须要更新与重建价值系统。要真正了解中国的文化传统，发掘有助于现代化的精神资源，建立新的价值观念。他说：“只有在建立了新文化价值之后，不合时宜的旧文化价值才真正会让位。传统是无所不包的，其内容也是随时在改变的。文化只能推陈出新，既不能无中生有，也无法完全从外面移植过来，有志于文化重建的中国知识分子首先便要真诚地去了解中国的文化传统，并在传统中寻找有助于现代化的精神资源。这是西方的启蒙运动给我们的一项最重要的启示。”^{[5](P165-166)}余英时自己就曾著专文“试图从价值系统的核心出发疏解中国文化在现代的转化”。^{[5](P43)}

（二）坚守学术独立

根据中国传统理论，道统本在正统之上；学术思想较之政治是更具有根本性质的人类活动。然而以实际情形而言，政治在整个中国文化体系中却一向是居于中心的位置。自汉代经学与利禄相结合以后，学术思想的领域便很难维持它的独立性，而成为通向政治的走廊。在这种风气长期熏陶之下，中国知识分子无形中养成了一种牢不可破的价值观念，即以为只有政治才是最后的真实，学术则是次一级的东西，其价值是工具性的。

余英时认为现代中国最流行的错误之一，便是把一切希望都寄托在政治变迁之上。由于“学术是政治的工具”这一观念的根深蒂固和牢不可破，近现代史的一切文化运动最终都被化约为政治运动。而在另一方面，政治运动在一开始则往往习惯于假借学术或文化的名义。换言之，政治永远是最后的目的，而学术与文化不过是手段而已。

因此，要重建中国文化，就要从价值观念的基本改变开始，就要求我们必须把注意力和活动力从政治的领域转移到学术思想的阵地上来。这一观念上的转变也是中国现代化的一个先决条件。余英时指出“学术和文化只有在民间才能永远不失其自由活泼的生机，并且也惟有如此，学术和文化才确能显出其独立自主的精神，而不是政治的附庸”^{[2](P432-434)}。

当然，余英时主张走民间发展学术和文化之路，并不表示学术与文化必然是和政治处在对立的地位或与政治不发生任何关系。余英时认为，一方面，学术与文化有时可以是一种“批判的力量”，但这种批判的锋芒并不是专门指向政府的；另一方面

面,政府对学术与文化有从旁去支持与奖励的责任。

(三)处理好中西文化关系

余英时认为中国的传统文化不但丰富、复杂,而且具有很多的层面,我们决不能笼统地看待它或加以简化。文化重建一方面要以中国历史和文化传统为主体,通过它的种种内在线索,进行深入的研究,发挥中国文化中那些历久而弥新的成分。另一方面在中国文化重建的过程中,西方的价值观念将在其中扮演重要角色,因此我们要保持一种开放的心灵,“退而结网”,积极地吸取西方文化的精华为我所用。面对西方文化的挑战,中国文化要不断调整和更新。中国文化系统将因吸收外来的新元素而变化,却不能被另一系统(西方文化)所完全取代。只有在经过现代洗礼之后仍能保持其传统的特色,中国文化才算是真正获得了新生。^{[1](P434-440)}

(四)知识分子成为社会重心

知识分子是文化的创造者和传播者,在文化价值的阐述、维护和传播上起着重大的作用,现代的价值观念和行为的变迁,追根溯源,也是从知识阶层逐渐向全社会渗透的。让知识分子成为社会重心,是中国文化重建的一个重要前提。

就中国历史而言,尽管过去王权是高高在上的,但在一般社会上,知识分子依然是“四民之首”,一向为多数人所尊敬,这一历史传统直到如今都未打破。余英时认为今天中国的知识分子也应该成为中国社会的重心。一方面,知识分子比较能超越经济利害,不致因为某种特殊利益而与其他社会阶层发生严重的冲突。同时,由于现代普遍推行教育,知识分子数量逐渐增加,他们本身因来自各不相同的经济阶级,比较有包容性。而且知识分子越发展、数量日益增多,则社会的民主气氛也会越浓,

不像某一特定阶级有发展上的必然限制。另一方面,人类社会的发展必须具有一种高度的理想主义精神,以为整个社会的指导。这种理想主义的精神是与知识分不开的。如果知识分子可以成为社会重心,则此种精神的保持会比较容易。反之,某一特定的经济阶级却常不免因为利害关系而丧失此种理想主义的精神。领导社会的分子一旦为私利而损害最大多数人民的最大福利,社会就难免趋向解体。

关于知识分子如何成为社会的重心,余英时明确提出了两点:一是的确能在文化上有所建树,足以领导社会前行;二是要能身体力行,实践自己所倡导的理想,而不能和过去一样,只会坐而论道。文化工作是实实在在的,绝不容许投机取巧。倘若知识分子不能切切实实地做好文化工作,他们就不配,同时也不可能成为社会重心而获得大多数人的景仰与尊敬。这样一来,不但知识分子本身的前途毁灭了,中国文化重建也会受到严重影响。^{[5](P206)}

参考文献:

- [1] 余英时. 钱穆与中国文化[M]. 上海:上海远东出版社,1994.
- [2] 余英时. 文史传统与文化重建[M]. 北京:三联书店,2004.
- [3] 余英时. 现代危机与思想人物[M]. 北京:三联书店,2005.
- [4] 辛华任. 内在超越之路——余英时新儒学论著辑要[M]. 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2.
- [5] 余英时. 文化评论与中国情怀[M]. 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
- [6] 余英时. 中国思想传统的现代诠释[M]. 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8.

(责任编辑:陈 伟)

An Exploration into Yu Yingshih's Idea of Cultural Crisis and Cultural Reconstruction

LI Meng-yun

(Social Science Department, Wenzhou Medical College, Wenzhou, Zhejiang 325035, China)

Abstract: Yu Yingshih believes that the traditional culture has been destroyed because of the continuous radical ideas in modern times. The political and utilitarian pursuit in academic field is doing harming to traditional culture. So we should realize the importance of cultural reconstruction. Certain elements of modernity in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 have provided the impetus for the reconstruction of Chinese culture. From that Yu Yingshih puts forward some suggestions to reconstruct Chinese culture.

Key words: Yu Yingshih; cultural crisis; cultural values; cultural reconstruction